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1936.* By ADAM MCKEOW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xi, 349 pp.**

以往對於海外華人的論述多局限於民族國家範圍之內，討論的主題大都涉及華人移民在所在國的適應、認同、融合或同化等問題，其最終所導致的是海外華人社會被人為地分割為眾多處於不同地域空間的獨立個體。它們之間彼此隔離，似無聯繫。這一書寫方式實質上反映了「民族國家視野和框架下的一種定向思維，其所強調的是華人與政治上的國家疆界之間的不可分割性」。**【劉宏，《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二十一世紀》，第71期（2002年6月），頁120。】**然而，實際上，海外華人社會並非鐵板一塊。近年來，隨着海外華人跨國活動的日趨頻繁與顯著，人們逐漸意識到「以民族國家和固定不變的地理（fixed geography）為依託的理論似乎已力不從心」**【劉宏，《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頁120。】**，學術界需要一種新的方法或理論來重新建構和解讀過去以及當今的海外華人社會。在這種情況下，跨（國）界研究應運而生。人們試圖打破民族國家之理論框架，以跨越國界的全球視野來重新審視海外華人社會的歷史與現狀。Adam Mckeown 的此部著作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他以秘魯、芝加哥、夏威夷三地的華人社會為考察對象，論述了20世紀初期華人移民的跨國網絡與社會活動，繼而比較性地揭示了三地華人社會的特徵與差異。

該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詳細闡述了本書的理論框架。基於「民族國家」論說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之不足，作者選擇了在全球視野下以「跨國網絡」、「跨國聯繫」為主要關注對象的跨國主義理論，「它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移民是如何既生活在這裡，又生活在那裡的」（頁1）。但這並不意味着華人跨國主義的研究徹底擺脫了民族國家話語的束縛，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前者仍然受到後者的制約與影響。作者同樣意識到了這一點，並對國家或地方歷史的特殊性與重要性給予了充份的認識，力圖最終達到將「在地知識」與「全球視野」相結合，形成一種「融區域研究、跨國活動與全球模式為一體」的理論分析架構（頁7）。

第二章着重介紹了秘魯、芝加哥、夏威夷三地的移民法律、華人口口狀況及其經濟活動。在傳統的民族國家理論框架下，以往的研究多把華人人口的減少、男女性別比例的失調歸咎於當地排華法案的影響，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如在秘魯，排華法案直到1930年才有系統的加以實施，但在此之前，

當地華人婦女的比例卻遠遠低於夏威夷與芝加哥；而處於美國本土的芝加哥，雖受排華法案影響最甚，但卻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着華人男子數量居高不下的態勢。對此，作者認為，「排華法案並不是影響當地華人人口的決定因素」，「社會接納（social acceptance）與移民進展也並無直接的聯繫」，只有把「全球經濟聯繫與華人跨國家庭的生存策略考慮在內」，才能對上述歷史現象有一個清晰的理解（頁25）。

早期海外華人社會的面貌特徵與中國本土文化緊密相連，因此，作者在第三、四章對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做了背景性的論述。尤其在第四章，作者突出介紹了秘魯、芝加哥與夏威夷三地絕大多數華人移民的祖籍地——華南地區，尤其是廣東地區的社會組織與宗教儀式。在作者看來，家鄉的社會組織是海外華人形成各種社團並進行跨國聯繫的基礎（頁104），鄉土的宗教儀式則為海外華人與所在國居民的相處以及適應當地環境創造了有效的途徑與空間（頁101、118）。但遺憾的是，就後一點而言，作者在後面針對三地移民的具體分析中並沒有將其有效地結合進去加以論證。

第五、六、七章是該書的主體部份。作者圍繞「網絡」、「國際地位」、「種族認同」與「個人」四大要素，分別對秘魯、芝加哥和夏威夷三地的華人社會進行了闡述，具體展現了在20世紀初期的三十多年中，華人移民的跨國網絡是如何在不同跨國場景下得以運作並於當地產生影響的，進而在此基礎上揭示了三地華人社會的個性特徵。可以說，這種在全球視野下對史料的解讀讓我們看到了以往傳統（以民族國家為論述框架）的相關研究所未曾呈現的歷史場景。

在秘魯，20世紀初期少量華人新移民的湧入給當地華人社會帶來了關鍵性的轉機。華人資本、其商業抱負以及與香港、中國大陸、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所建構的強勢網絡，有力地扭轉了早期華人移民近乎融於土著下層社會的趨勢，重新把他們拉入了華人移民的社會網絡之中。商業活動作為當地華人依血緣、地緣等紐帶而形成的各種網絡的「中心元素」（頁139），不僅為華人跨國網絡的運作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平臺，也最終建構了20世紀初期的秘魯華人試圖以一種世界商人的形像出現於歷史舞臺之上的全球畫面。

在芝加哥，由於受到當地各種社會因素的制約以及美國排華歷史的影響，華人邊緣化的社會地位使他們自成一體，形成了具有高度封閉性的「唐人街」。儘管各種華人社團組織與跨國網絡依然存在，但芝加哥的華人社會卻因地域環境的差異而形成了有別於秘魯華人的社會特色。如由於華人在當地難以獲得賺取大量財富的有效途徑，致使華人社會的權力核心已不再是擁

有商業財富的個人，而是以社團形式組織起來的群體，而其中又以結義性質的「堂」最爲突出（頁20、179）等。雖然在這一章，作者以1904至1912年間芝加哥華人社會的內部矛盾爲主要論述線索，但在這種地方歷史之中，我們卻看到了20世紀初期華人移民、跨國網絡、民族主義政治、本土地方政治、地方經濟利益以及種族認同等多種因素在全球範圍內錯綜複雜的交叉互動，再一次凸顯了本書「在地知識」與「全球視野」相結合的理論架構。

與秘魯、芝加哥相比，夏威夷華人社會的人口結構更具特色。至1930年，夏威夷的華人口有近一半出生於當地。他們沒有親身的移民經歷，因此，與當地的融合程度爲三地之最。那麼，跨國主義理論是否適用於對當地華人社會的解析呢？在深入發掘史料的基礎上，作者發現，「早期華人移民的組織與遺留、中華民族的聲譽以及跨國網絡所帶來的機遇仍然在持續地影響着當地華人的行動與公眾關係」（頁224）。如20世紀初期，以地緣、血緣爲紐帶的華人社團在土生華人中的復興，不僅加強了土生華人對自己種族身份的認同，使其服務於當地的華人社會，更重要的是強化了正趨於減弱的華人跨國網絡，爲當地華人與外部世界的跨國互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最後一章，作者對全書加以總結，將秘魯、芝加哥、夏威夷三地的華人移民置於20世紀初期的世界秩序下分析比較，闡述了其異同性。

總之，通過對美洲秘魯、芝加哥、夏威夷華人移民的比較分析，該書以全球視野向我們展現了在20世紀初期的三地華人社會中，個人、地方（家鄉與僑居地）與國家（祖籍國與僑居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上的跨國性互動，打破了以往以民族國家爲理論基礎的傳統分析框架，將地方歷史與全球體系有機地融爲一體，使華人移民歷史進一步逼近真實。

但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似乎忽略了華人社會內部人口構成的差異。至20世紀30年代，三地華人社會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新移民、老移民以及土生華人之分。既然如此，不同的成長背景與生活經歷必然使得這些不同類型的華人移民在跨國活動上有着相異的態度與表現，也就是說他們代表了不同類型的跨國網絡文化。其具體差別可表現在建構網絡之原因、構成網絡的中心元素以及網絡的密度與強度等。不僅如此，如果對同一類型的華人移民加以細化，我們還會發現即使在最具跨國活動能力的新移民群體中，實際上也存在着個體移民跨國活動與跨國網絡的持續與斷裂。但就上述所言，作者在本書中除了對夏威夷的華人移民略作相關表述外，對其它兩地的華人並未作出具體的區分與闡析。可以說，就跨國主義理論框架下移民群體所存在的「同質」與「異質」這一問題而言，作者在論述中並沒有給予充份的重

視。

儘管如此，該書仍是一部以全球視野來研究近代美洲華人移民的優秀著作。它較為成功地將近年來源於社會學的跨國主義理論「歷史化」，並有機地將其與傳統的民族國家論說相結合，從而為海外華人研究領域展現了一個甚為寬廣的視野與前景。

任娜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5，321頁。

《事件·記憶·敘述》封面底頁上的內容提要要是這樣介紹此書的：「這是一本有關新社會史研究的論著，收入中外新銳歷史學家論文十餘篇。作者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國歷史進行了多元化、多方位的反思和探討。」這是編者對於此書定位的表達，用以總括書中多位作者的研究旨趣與方法當是再合適不過了。

主編孫江以文章〈閱讀沉默：後現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作為本書的序言。孫氏此文主要圍繞後現代主義給現代歷史敘述帶來了什麼，歐美新史學如何回應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等問題探討「新史學的後現代化」問題。他認為，「中國新史學的再生必須以清算自身的舊歷史即放棄結構的整體史的敘述和正面回答後現代的挑戰為起點，這是建設中國新社會史的關鍵所在。」（頁21）孫江對中國新社會史的發展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放棄構建整體史的野心。他談到，今日史學的實踐業已確認歷史學家不可能構建整體史，構建整體史的努力窒息了歷史的發展。二是，實現歷史認識論的轉變。他認為新社會史可以接受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關於解讀文本的觀念和方法，但決不能把文本與產生文本的語境割裂開來，否則，新史學在歷史內將沒有立足之地。三是擺脫以美國為中心的中國研究。他強調，擺脫以美國中國學為中心的中國研究，並不是要以狹隘的民族話語否定美國中國學，而是要求把美國中國學的文本與產生文本的現實語境結合起來放在全球範圍內重新認識和對待。主編的三點建議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現代史家在擺脫史學困境時的努力。

本書的12篇論文置於四個主題之下。第一個主題「政治·事件的閱讀方法」，收入了五篇文章。對「精英」問題的討論是前三篇文章關注的焦點。